

台灣民主主義教育的倡導和實踐者—林茂生

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副教授 張妙娟

一. 家世與求學

林茂生，字維屏，號耕南，1887年（清光緒13年）10月30日出生於台南府城，父親林宴臣（1859-1944，後改稱燕臣）為清季秀才，母親郭寬，外祖父亦為台南舉人，可謂出身書香門第。1898年1月林燕臣受邀教導英國長老教會（The Presbyterian Church of England）的傳教士們學習漢文和閩南語，教學期間，他深為博學多聞的傳教士們遠渡重洋來台奉獻的宗教情操所感動，因而開始慕道、讀聖經，同年9月10日在台南亭仔腳禮拜堂由巴克禮牧師（Rev. Thomas Barclay，1849-1935）為他施洗成為基督徒。不久又應聘到「中學」（今長榮中學前身）教授漢文，兼任舍監，並協助安彼德醫生（Dr. Peter Anderson）翻譯醫學書籍。林燕臣受洗成為基督徒後，積極參與教會事務，經常外出佈道傳講福音，擔任太平境教會長老，最後並成為傳道師，全心投入教會工作，曾先後擔任高雄州東港教會牧師（1914-1922）、竹仔腳教會牧師，長老教會南部大會議員（1912）、台灣大會書記（1915-1916）等職務。此外，他也曾擔任長老教中學的「教頭」（相當於教導主任），在中學任教長達17年，1925年又受聘任教於台南神學院歷時十年，直到1934年退休。

因著林燕臣從出身傳統儒學門第轉而歸向基督教信仰，林茂生的幼年家學因此受到兩方面的啟蒙，其一是厚植漢學根基，其二是建立基督信仰並開啓接觸西學的途徑。由於父親及外祖父均曾開設私塾，林茂生自幼習讀四書五經，滿二歲時就能背誦詩詞。五、六歲時，母親特地為他準備三個油面磚，以及用竹節縛稻草絲做成筆作為習字之用，林茂生也因此練得一筆好字。因為「作文寫字幾成一家，號稱『小童生』」。就讀中學時期林茂生也時常接受當時教會公報社經理孫耀雲之請託，為教會書寫十誡的中堂和闡明教義的對聯，提供信徒置放家中廳堂，以表明信仰。

1903年林茂生進入長老教會的中學就讀，因為漢學的根基超越同儕，其他成績也常名列前茅，英語成績尤佳，費仁純（F.R. Johnson）校長任職期間（1901-1908）請他協助教第三班和第四班的漢文、地理和算術，有人遂稱他為「半仙」（助教、小老師之意）。

身為長子的林茂生，因為父親受洗而開始接觸基督信仰與教會生活，進入長老教會的中學就讀也使其教育歷程走出傳統儒學的範疇，學術訓練趨向豐富多元。在教會中學，除了接受西方現代化課程之外，因為教導一位英國女士學習漢文，林茂生得以透過交換學習加強英語文能力，又跟從傳教士夫人學會彈奏鋼琴和風琴，是當時教會內唯一能彈琴的青年。1907年自長老教中學畢業時，年輕的林茂生已是一位多才多藝、中英文俱佳的青年。1908年1月，林茂生由於中學成績優異，受到教會的資助前往日本留學，先進入京都同志社中學四年級，一年後考入京都第三高等學校文科。上第一堂英文課時，英國籍老教授即發現他的英文程度很好，因而請他代為抄寫正在撰寫中的著作，並付給雙倍的薪資。自第三高等學校畢業後，林茂生順利考上日本最富盛名的學府—東京帝國大學，主修東方哲學，對陽明學說更有專攻。

二. 撰寫論文批判殖民教育

除了教會學校、日本留學的經歷之外，赴美國研讀教育也是林茂生學術養成訓練中極為重要的一環。1927年林茂生(當時亦兼任台南高等商業學校教授)接受台灣總督府及文部省的遴選，成為「在外研究員」，赴美國留學。同年5月11日由基隆搭乘扶桑丸號輪船先到東京，6月11日轉乘太洋丸號郵輪自橫濱啟程踏上留美之途。林茂生進入紐約哥倫比亞大學教師學院(Teacher's College)就讀，跟隨著名的教育哲學泰斗杜威(John Dewey)與門羅(Paul Monroe)教授。翌(1928)年夏天取得文學碩士學位，並且繼續攻讀博士課程。1929年11月，又以優異成績獲得哲學博士學位，他的博士論文題目是《日本統治下臺灣的學校教育：其發展及有關文化之歷史分析與探討》(*Public Education in Formosa under the Japanese Administration--A Historical and Analytical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and the Cultural Problems*)，他也是台灣在美國榮獲哲學博士的第一人。獲此殊榮的過程中，林茂生卻是在經濟窘困的情況下完成此一學位，赴美的第二年，因台灣總督府資助時限已屆，乃由哥倫比亞大學與台灣總督府協議各自分擔部份獎學金，其不足之經費則由在台灣的妻子王彩繁女士籌措借貸。一直到二次大戰結束之後，林宗義(林茂生次子)任教於台大醫學院時，仍在償付這筆借款的利息，1946年才全部償清完畢。

值得一提的是，林茂生的博士論文主題其實是對自己整個受教育訓練過程與當時台灣社會教育情境的總反省，他運用近代民主主義教育的理念檢視當時日本

在台灣的殖民教育，發現真正的近代教育強調啓發學生個人內在的創造力、尊重學習者的人格與自然能力、以及傳授對學生的生活有直接必要的知識，但日本的同化教育卻無視於台灣與日本文化之差異，強制灌輸有利於統治者的教育，與真正的教育目的背道而馳。

從幼年、中學到國外留學，每一階段求學歷程中，林茂生的聰慧、勤學與優異都是有目共睹，其學術訓練融合中西，也奠定日後其教育事業的豐富內涵。

三. 獻身教育作育英才

林茂生的學校生涯始於長老教中學，職業生涯也由此出發，教育爲其一生主要職志。1916年林茂生畢業於東京帝大文學部哲學科後，同年9月隨即返回母校任教，校長萬榮華（Edward Band）聘他爲教頭（head-teacher，相當於教導主任），教授世界歷史課程。自1916年9月任教於中學直到1927年赴美留學之前，林茂生最主要的工作可說是積極籌募基金，促使學校得以立案。當時教會學校屬於未經立案的私立學校，師資不足，畢業生不能得到認可，因此逐漸影響到中學招生人數。身爲教導主任，林茂生深感責任重大。1924年台灣總督府准許中學籌募學校基金，林茂生兼任「學校後援會」會長，積極推展「學校基金募捐運動」，俾使學校得以達成立案之目標，改善師資，得到政府認可，長老會中學畢業生也可以順利升學。爲募集十萬日圓（約合一萬鎊）資金，林茂生到處旅行，發表演說，勤寫書信勸募，中學的課程就交由萬榮華校長代理。不到幾個月就得到2000鎊的允諾捐獻，校長深知募款對學校前途意義重大，對於林茂生如此盡心奔走深爲感動，認爲學校立案一事「好比是座建在空中的經濟堡壘，我是內部的棟樑，而他（林茂生）是流動的拱壁！」1926年5月允諾認捐的金額已經達到十萬圓的目標，捐助者多達七百人以上，而且捐款以每人平均130圓爲限，其中包括許多非基督徒的支持者。1927年林茂生赴美留學後，募款工作交由林明海老師繼續負責，這些認捐的款項直到1929年才真正繳清，而到1939年長老教中學始獲准立案。

林茂生第二次回任教職是在1930年1月自美國取得博士學位之後，先是回到長老教中學服務，5月間奉派到台北高等商業學校任職，並且仍然留在中學擔任理事和負責「後援會」的工作，爲學校立案問題上總督府交涉。1935年，林茂生又奉派轉到台南高等工業學校，擔任英語德語科主任，並兼圖書課長，職位是正五位（相當於今之薦任官）。曾經就讀這所學校的醫師作家吳新榮、張深切都認爲林茂生「教學輕鬆而幽默」，深得學生愛戴。

1945年8月，日本戰敗投降，台灣回歸祖國懷抱。林茂生受聘為台灣大學教授，兼校務委員和接收委員，因此全家遷居台北，定居於台北市錦町（今大安區）。12月開始擔任國立台灣大學先修班主任，後又在新校長羅宗洛的邀請下代行文學院院長職務（沈剛伯院長尚未到任）。同時，台灣省政府教育處處長范壽康組成教員甄選委員會，林茂生也是十二位委員之一。

四. 致力啟迪民智與傳播文化

從事學校教育之外，林茂生也是一個積極的社會教育工作者。他對社會與時局的關懷表現在他的實際行動中。1921年10月17日蔣渭水與林獻堂成立「台灣文化協會」，以助長台灣文化之發達為目的，其真正目的更在促進台灣民眾的民族自覺，也帶有政治意涵，林茂生被推選為評議員。1923年9月起，台灣文化協會開始在台北、台南等地舉辦各種講習會，期能啟導民眾，「謀台灣文化之向上」。1924年7月，原本預定由在台南商業專科學校任教的林茂生演講西洋歷史，為期兩週，卻遭政府駁回。同年10月20日起，台南「台灣文化協會」幹部利用基督教青年會的名義舉辦西洋歷史講習會，由林茂生擔任講師，一連講了九次。台灣文化協會所舉辦另外一項極具特色的活動是「夏季學校」，自1924年起連續三年在霧峰林家的萊園舉辦為期兩週的夏季學校講習會，林茂生也是列名其中的主要講師之一，第一次主講哲學，第二、第三次則講授西洋文明史。

除了授課、演講之外，林茂生也嘗試辦報，透過印刷媒體為戰後回歸祖國的台灣民眾發聲。1945年冬，他結合日治時期《興南新聞》的台籍工作人員在台北創辦了《民報》，由他擔任社長，許乃昌任總編輯，總主筆為陳旺成（黃旺成）。《民報》自我期許成為一份「嚴正的言論機關，作不偏不黨的報導」、「促使台灣明朗化，進而為民族的正氣的原動力，協力建設新憲法下的民主國家」，對於戰後政府施政、社會弊端、民生經濟等課題報導巨細靡遺，反映民情，也直言針砭勸諫。1946年1月底到2月上旬短短十餘天之內，《民報》就揭露六則貪污的新聞，平均幾乎兩天一則。以1946年2月上旬《民報》報導有關軍警人員動輒持槍為非作歹的新聞標題為例：『左營海軍軍人槍殺當地民眾／一事未平，又以手槍威脅郭區長』（2月2日）、『我是接收委員／要什麼票？／竟以手槍威脅驗票員』（2月9日）、『高雄市碑子頭市場國軍白晝搶魚商卓乞食現款六百』（2月10日）、『高雄國軍一群聚賭於倉庫／因被陳夫人勸止／竟毆打苓雅寮區長陳夫人』（2月10日）。由上

可知，《民報》勇於揭露當時政治社會的黑暗。雖受讀者歡迎，卻使政府當局芒刺在背，有人認為林茂生或許因此招禍。

從 1916 年畢業返台任教中學到台北高等商業學校、台南高等工業學校、台灣大學，林茂生堅守學校教育崗位將近三十年，教育可說是他一生的志業，不論是學校教育或是社會教育，他都竭盡所能。整體而言，林茂生對殖民統治下台灣的處境有很深的關切，作為一個感時憂國的知識分子，透過教育啓發民眾自覺是實現理想的重要途徑，林茂生運用其專業素養參與社會活動也是不遺餘力。

三. 基督信仰與文藝才華

自 1898 年林燕臣受洗為基督徒並獻身傳道事業後，林茂生的生涯發展實與基督信仰密不可分，例如 1904 年就讀台南長老教中學、1908 年獲得教會資助留學日本同志社中學、1916 年返回臺灣擔任長老教中學教務主任、1924 年成立「後援會」為中學募集立案基金，以及 1934 年辭去長老教中學理事等均是，但此一信仰因素對林茂生生涯的影響卻常被忽略。事實上，林茂生對於教會事務與教育也積極投入，其所展現的學術素養與文藝才華更為豐富耀眼。現存台灣長老教會機關報--《臺灣教會公報》即留下不少林茂生以羅馬拼音白話字所撰寫的作品。日治時期林茂生在《臺南教會報》、《臺灣教會報》、《臺灣教會公報》發表作品始自 1908 年 9 月，而終於 1935 年 3 月，先後刊載文稿計 51 篇次，依其主題可概分為京都見聞、時勢和人物感懷、劇本編寫、語文教育、基督教文明史觀等五大項，從這些作品可以看到林茂生在現實生活中所呈現的信仰情懷。

以京都見聞為例，1911 年 5 月 7 日「京都臺灣青年會」成立之後，林茂生不但詳實記錄報導留學日本的台灣青年們集會的動態，也和周天賜一起擔任幹事，積極參與社團工作。他認為「京都臺灣青年會」創立之初雖然是為了使離鄉背景的留日學生彼此在學業和生活上聯誼互助，但最終的關懷仍在於鞏固基督徒學生的信仰根基。當時在京都留學生共有 14 人，其中 11 人曾經就讀過台南長老教中學，非信徒學生只有 3 人，因此，該會的基本成員大多是台南長老教會的子弟，其組織和活動都具有濃厚的宗教性，但並不排斥非信徒學生，反而將引導未信上帝的學生作為該會目標之一，此乃傳福音的使命感使然。可見「京都臺灣青年會」並非單純的留日同學會或是聯誼會，乃是擁有更高精神層次與宗教目標的基督信仰團契（fellowship）。到 1913 年 5 月「京都臺灣青年會」的會員已增至 38 人。

自 1924 年 11 月起連續刊載四期的「路德改教」劇本，主要是表達馬丁路

德（Martin Luther，1483-1546）抗議羅馬教會罔顧教義販賣贖罪券斂財的荒謬，以及其提出〈九十五條綱論〉後遭受審判，並與政教權威辯論的經過。無論是場景說明或台詞敘述，林茂生都有幽默生動的筆觸。例如第一幕在威登堡（Wittenberg）鄰近鄉村的教會場景，其舞台佈置如下：

「禮拜堂門口豎立兩枝大旗，一枝畫著紅色十字架，另一枝旗寫著『天來萬應膏，一服罪皆赦，趕緊來！趕緊來！』禮拜堂內擺著一張錢櫃桌，桌上有一大疊的赦罪符，一封一封疊著。台徹爾教士坐在桌子後面，樣子很像掛招牌在走江湖的人。」林茂生設計的這齣西洋教會歷史劇舞臺彷彿臺灣鄉村廟埕前江湖郎中擺攤賣膏藥，又將贖罪券與道教「符」的概念和萬應膏（即鴉片）相提並論，實是非常本土化又容易理解的比擬和設計。

〈基督教文明史觀〉（A Historical Review of Christian Civilization）一文可說是林茂生歷年發表於教會報的作品中最具論述性、篇幅最長、但沒有完成的作品，該文自 1932 年 6 月起連載 14 期，企圖剖析基督教文明的特質，以及其將近兩千年錯綜複雜的歷史發展脈絡，林茂生任教中學時即負責「歷史」課程的教學，參與臺灣文化協會活動時亦曾主講「西洋文明史」課程，可見其對西洋歷史的苦心鑽研。林茂生特別強調基督教觀點與其他宗教的差異性，例如「上帝」的觀念，中國儒教有「天」，日本神道教有「神祇」，但基督教的「上帝」意涵則是全宇宙的主宰，超越其他的神祇、也是天下所有人的神。「罪惡」在其他宗教都是指違背了人類社會的法律，但是基督教認為，人不論多麼守法、道德高尚、是個好人，在心靈中若不承認唯一的上帝就是「罪」。此外，就「道德」觀念而言，基督教的道德原動力是來自於上帝，而不是良心的譴責或是為了行善積功德。因為基督教有人類愛的觀念，因而積極向外邦傳福音。就歷史發展來看，受到基督教海外傳教運動影響而產生文化衝擊的國家有兩大類，一是未開發的國家，完全被基督教文明同化，也失去自己古老的文化傳統，例如非洲各國。一是已有悠久文化傳統的國家，例如印度、中國和日本等，雖然不是全部接受基督教文明，但其固有文化中的宗教、道德、學術、政治、經濟及風俗習慣等皆有某些程度的改變。值得注意的是，林茂生並未迴避基督教海外傳教歷史與帝國殖民主義擴張兩者之間關係的討論，基本上，他認為基督教積極傳教的原始動機是純宗教性的，與帝國殖民主義無關：

「若說近代基督教向異邦傳道是專門為了做帝國主義的爪牙、或是手下，這

是不懂或是故意，無視於歷史上的事實來揣摩臆測的議論，沒什麼可辯駁的價值。歷史上常有兩種毫無因果關係的事實同時進行、交錯，使人看了好像有因果關係存在，帝國主義在擴充版圖與基督教異邦傳道的關係差不多就是如此。」

由此看來，林茂生的歷史觀及其字裏行間仍流露一種保守、護教的精神。身為臺灣的基督徒，又曾留學日本和美國、攻讀過東方哲學和西方教育，林茂生字裏行間流露出對於文化差異的敏銳觀察視野與本身信仰的理念。

自 1933 年 12 月起林茂生著手為《臺灣教會公報》撰寫一個新專欄--〈新臺灣話陳列館〉，主要在介紹日本殖民之後臺灣社會所衍生出的一些新詞彙，至 1935 年 3 月止共連載 15 期，收錄解讀了 133 個語詞，多是生活常用語，涵蓋法律、政治、商業、文化等範疇，可謂包羅萬象。每一頁的篇幅中收錄數個語詞加以解析，並附註漢字原典、英文和日文，以及相關的引申詞彙。單就使用的文字而言，一個語詞的說明必須使用到漢字、英文、日文，加上教會報用以刊行的羅馬拼音白話字，一共使用 4 種文字來幫助讀者了解新臺灣話的內涵，堪稱是多語合一的辭典。林茂生自美國留學返台之後，1931 年起即擔任台南高等工業學校英語德語科主任，外語能力加上漢學的素養，確實是撰寫此一專欄的不二人選。試舉兩例翻譯說明如下：

「Goân-khi (元氣): 身體有力氣。(=genki=vigour) 他真有元氣(=Kare wa nakanaka genki ga aru=He is full of vigour.) 民國不用。【漢書律曆志】太極中央元氣，故為黃鍾。【後漢明帝紀】光武皇帝於明堂事畢，升靈臺，望元氣，吹時律，觀物變。」

林茂生認為新臺灣話有許多是從日語轉用而來，而不少日文的字根是取自漢字，部分語詞只需更換讀音或了解引申的意義，因此很容易被臺灣人接受而通行於社會。臺灣語言出現變遷是因為受到日本帝國引進新文明的影響，新文明帶來新生活、新思想，自然需要使用新語言。由新臺灣話的衍生，也可觀察出日治時期臺灣社會生活和語言文化的演進。林茂生的〈新臺灣話陳列館〉專欄不僅見證了當時臺灣語言的變遷，其詳加查考漢文原典、加註例句、英文和日文等解說，事實上也是透過教會報進行一項語文教育活動。

自 1934 年 11 月起連續 3 期，林茂生又另闢〈英臺俗語對照〉專欄，作為〈新臺灣話陳列館〉的附錄，主要收集文意相同的台語和英文俗語互相對照。他認

為俗語乃是用一句淺明的話來道出人情事理的奧妙，各地都有俗語的流傳，有些意涵是相同的，代表不同地方的人情事理也有其相通之處。試舉二例說明之：

「Every dog has his day.（大意：不論什麼狗都有它的日子，意思是，再倒楣也會遇到好運。）有時星光，有時月光。」

無論是留學日本的所見所聞、對當時教會人物的懷思、編寫宗教改革的劇本、或是撰寫語文教育專欄，林茂生都展現其多樣的藝文才華與豐厚學養。這位身處殖民統治之下，精通漢文、日文、英文、德文的臺灣知識精英也使用自己的母語書寫，在教會報刊留下其學術、信仰觀點的紀錄，後人亦得以觀察到林氏比較不為人知的信仰情懷。

五. 戰後參與教育文化的重建

擁有日治時期台灣第一位文學士、第一位高等官、第一位獲得外國博士學位的多重頭銜，林茂生無疑是一位極易引人注目的優秀人才，尤其他經歷兩個民族立場截然不同的政權時期，他所參與的任何社會或政治活動言行舉止都會備受關注。他曾參與的政治活動包括：1920年在《台南新報》發表一篇祝賀天皇生日的應景文章—〈國民性涵養論〉開始，林茂生曾參加台灣文化協會，擔任評議員和授課講師；當文化協會分裂後，他加入右翼的台灣地方自治聯盟；1934年為抗議長老教中學順應政府壓力去參拜神社而辭去理事一職，表現他對信仰的堅持。1941年4月，台灣總督府成立「皇民奉公會」，積極動員台灣民眾支持對中國的戰爭，林茂生與林獻堂、林呈祿、蔡式毅等社會菁英也被迫加入擔任各項職務。1945年10月，他在台北公會堂（今中山堂）發表慶祝台灣重回祖國的演說；創辦《民報》藉以關心時政，為民喉舌；11月又在台灣文化協進會邀請下，於台北第一戲院和陳逢源與廖文毅一起發表演講，題目是：「台灣文化之革命」。1946年7月，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辦理台灣省國民參政員的補選，有意參選的共有40人，林茂生亦參加這次選舉。

概觀林茂生曾參與的政治活動，顯示他對當時政局的關切與知識份子的社會參與之責任。大致而言，日治時期的林茂生參與政治活動雖多卻未深入，以他優異的學歷理當可以在許多政治社團中擔任更關鍵決策性的角色，但他似乎有所顧忌，不曾擔任真正的核心幹部，態度也顯得保守，以致有些人覺得他未能善用並發揮他的影響力。他參與「皇民奉公會」一事、開辦《民報》批判施政政府、堅辭國民參政員等也引發後人對其民族立場之爭議和辯論，有人指責他是親日順

民，巴望進台北帝國大學才不敢公然反日，卻對祖國政府強烈批判，但也有為他辯護抱不平的，認為從許多生活實例即可應證林茂生對祖國的嚮往與熱情，例如在家庭中他的孩子自幼讀漢文、羅馬字、從不說日語、進台灣子弟就讀的公學校受教育；林茂生雖然是「皇民奉公會」的成員，卻不改為日本姓名，家庭也不是「國語家庭」，1928年與台北帝國大學的幣原坦校長面談完後，即向夫人表示「台北帝大是要為日本的南進政策服務的，不希望為這種政策效力。」林茂生擅長以漢詩明志，日本投降後寫下〈八月十五日以後〉的七言律詩，其中詩句「從此南冠欣脫卻，殘年儘可付閒鷗」，流露出興奮嚮往之情。至於他在日治時期沒有十分積極投入社會運動的原因，他的次子林宗義也道出其中的隱情：「當時總督府明文規定，凡官吏不得參加社會運動，否則一律解職。家父自認上無瓦片，下無寸土，必須繼續保有教職，養家活口。」林茂生因為任公職而受約束，也因家計而受牽制，實有萬般無奈在其中。

戰後初期，林茂生在的態度轉而趨向積極強烈，例如《民報》社論常對社會不法案件、陳儀施政的錯誤採取嚴厲批判，並呼籲新聞界一起力爭言論自由，以面對政府開始推行的新聞審查，論者因而認為《民報》的報導得罪當局是造成林茂生日後遇害的主因。此外，雖然有《民報》同仁的反對，林茂生仍報名參與國民參政員的選舉，抽籤中選之後，聲明辭退國民參政員，卻又於1946年12月加入「正氣學社」，這是以台灣警備總部人員為主體的外圍組織，足見林茂生與當時政壇人士仍保持一定程度之來往。由此可見，林茂生對政治的參與投入不同於日治時期，或許也反映他對國民政府愛深責切的期待。

1947年2月27日因為台北的查緝私煙引發的二二八事件，造成全台灣民眾的不安，身為傳播媒體的社長，林茂生自然感受到風聲鶴唳的情勢與前所未有的憂心。3月4日他受邀參加「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發表簡短的談話，又前往台大參加另一個委員會。此後，他不曾再出席任何與二二八有關的活動。不料3月11日清晨，兩位武裝人員以台大校長有口信為由帶走林茂生，從此一去不回。據官方檔案，林茂生被逮捕的罪名有三：「一、陰謀叛亂，鼓動該校學生暴亂。二、強力接收台灣大學。三、接近美國領事館，企圖由國際干涉，妄想台灣獨立。」惟真相如何，迄今仍有待查明。

從傳統儒學跨越到西方文明，林茂生的學術訓練融合了東西文化、傳統與現代，藉由多樣化的文藝才華，奉獻於教育與文化是他生涯的著力點，但知識分子

的理想與現實政治的差距使他在經歷兩個不同民族立場的政權轉換時，充滿迎拒之間的心理掙扎，「學而優則仕」的傳統並未順利在他身上落實。七七事變後，與他同在台南高等工業學校任教的同事潘貫曾以一首七絕「偶感」相贈：「運河秋水碎銀瀾，唱曉孤舟韻帶酸。氣節未隨時節變，天心空對道心寒。」林茂生也以原韻和之：「可無隻手挽狂瀾，歌哭終難慰鼻酸。歲序易過人易老，空留一劍匣中寒。」這首詩可說是他壯志未酬的心境最好的寫照。

參考書目

《臺南教會報》

《臺灣教會報》

《臺灣教會公報》

《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二）》，台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1992。

王世勛：〈臺灣人走台灣路—林宗義博士談「林茂生百歲紀念會」〉，
《台灣新文化》13期，1987年10月。

王詩琅譯註：《臺灣社會運動史—文化運動》，台北：稻鄉出版社，1988。

吳濁流：《台灣連翹》，台北：前衛出版社。

李筱峰：《林茂生、陳炳和他們的時代》，台北：玉山社出版公司，1996。

林宗光、陳芳明：〈以喜悅之情紀念台灣文化先驅者〉，《南方》，1987年10月。

林茂生：《日本統治下臺灣的學校教育：其發展及有關文化之歷史分析與探討》，
台北：新自然主義股份公司，2000年。

張妙娟，〈《臺灣教會公報》中林茂生作品介紹〉，《臺灣風物》，第
54卷第2期，2004年6月。

張厚基：《長榮中學百年史》，台南：私立長榮中學，1991。

黃彰建：〈林茂生之死考〉，《歷史月刊》第193期，2004年2月。

楊士養：《臺灣信仰名人傳》，台南：台灣教會公報社，1966。

賴永祥：《教會史話》，台南：人光出版社，1990。

賴澤涵：《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4。

戴胡慧玲：《島嶼愛戀》，台北：玉山社出版公司，1995。